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人生本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
每个人的生命史
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谈人生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主编：邓九平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三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人生本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
每个人的生命史
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谈人生

大众文艺出版社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主编：邓九平





青春岁月(节录)

周培源

中国
文化
名人
丛书

1937年夏,我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休假从美国回国,先去宜兴,携家眷一起返回北平。当我踏进清华的校门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日军攻打卢沟桥。中日双方军队交战的枪炮声自清华可清晰听到。

卢沟桥的枪声一响,许多南方人都离开北平。但在前线,宋哲元部的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率部奋起抗击日军。我想留下看看,暂时没有动身。不久,形势吃紧,我便携家眷搬到城里。8月5日,日军兵进清华园,水木清华从此变成了日军的疗养地,很快北平沦陷。我在城里住了几天以后,8月11日启程去南方。同行的人很多,除了我自己的家眷外,还有陈岱孙教授的父母等一行人。从北京到天津本来只需要三个小时的路程,由于沿途尽是日军运兵车,且火车每停一站,日本兵都要进车核查。所以我们一行到达天津,竟用了24个多小时。到天津以后,我们这支小队伍在英租界住了下来。

305

平津陷落以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南迁湖南,合组新校,定名长沙临时大学。8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常务委员的临大筹委会,着手筹备建校。

临大筹委会成立以后,梅贻琦给我汇来两千元钱,让我临时负责安排一下清华过往天津的教授。我先后安排吴有训、冯友兰等人从天津去长沙。10月10日,我从天津动身去长沙。因钱已



告罄，我又四处找人借了钱才成行。我们一行先乘船抵青岛、上海，后经宜兴、南京，几经波折，最后才到达长沙。

长沙临大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因日军攻占上海，沿长江向西逼近武汉，局势紧张，长沙临大又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之命西迁昆明。1938年2月中旬，从进行筹备起仅存在了五个月的长沙临大开始西迁。人员分两路：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向西经湖南、贵州到云南昆明，参加人员主要是学生。教授中有曾昭伦、李继侗、闻一多等11人参加。另一路是乘火车向南，经粤汉路至广州，取道香港达越南海防，然后由滇越路进入云南。我因携家眷，择南路于3月抵滇。西路“湘黔滇旅行团”经过千辛万苦，历时六十八天，行程三千五百里，于4月28日方到达昆明。

4月2日，教育部下令改组长沙临时大学为西南联合大学，定于5月4日开学。

联大初办分两部分。理学院、工学院在昆明市，称为西南联大本校。借昆华农校、昆华师范及拓东路迤西会馆、全蜀会馆和江西会馆等地上课。文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称为西南联大分校。1939年夏，西南联大新舍建成，投入使用。新校舍在昆明西大门外，占地120余亩，由100多所低矮的土墙泥地草顶的平房组成。除工学院仍在拓东路旧址外，其它三院均搬入简陋的新校舍。新校舍的起用，使联大不像最初那样分散。

联大的校务由校常务委员会主持。常务委员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主席原定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但因张伯苓先在天津，后移居重庆，从未到过联大，蒋梦麟则在日军占领越南以后，因日机常轰炸昆明而一直住在乡下，很少去学校，故联大八年实际上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持校务。

我一家初到昆明，经朋友介绍，先租住在当地一个资本家的一所房子，地点在观楼。没过多久，主人催要房子，我们就搬到城里。因为城里遭日机轰炸较厉害。住不下去便又在位于滇池西畔的山邑村租了一幢房子，有五六间。房子的主人是近代早期的



留美学生,已故去,房子由他的家人代管,由于年久失修,极其破旧。我找人修缮了一下,就与家人在这里住下。

山邑村在昆明城外西南,联大校舍在城西北。从山邑村去联大,陆路相距十九公里,走水路则要三个半小时。我在联大教授两门课,每周一、三、五到校上课。我的两个女儿也在山邑村以北几里地的车家壁上小学。为节省时间,我买了一匹马,这马是来自云南西部的永北马。云南西部多山,永北马是当地人做运输用的。马初被领进家门,步法很乱,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马训练好。

骑马去学校,比较省时,但养马是很辛苦的。每逢上课,不到六点钟我就要起床,喂好马,备上鞍,先送两个女儿去车家壁,然后再去学校。每周二、四、六不上,我送女儿上学后便驱马到山上吃草。“跑马行船三分命”,骑马是有风险的。有一次,马被车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但脚却挂在了马鞍上,马拖着我跑了长长的一段路,幸而被一位农民发现了,把马拦住,才使我得免于难。还有一次,我很晚从学校回家,马走失路,以致连人带马一起摔到一条沟里。两年以后,去联大的路修好了,我将马卖掉,换了辆自行车。

307

联大期间,教职员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刚到昆明,联大教师持的都是中央币。中央币与地方的滇币之比为1:10,大家的生活还可以。后来物价飞涨,有时上午发工资,下午物价就涨25%,加上国民党政府以战争为由,不断削减学校经费,联大教职员生活变得相当困难。到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月薪已由战前三百多元降至实值仅为战前的八元三角。由于生活困难,教职工始以积蓄补贴,继以典质接济,有的教员竟至无物典当,生活窘迫至极。昆明当时有“三员及地”之说,学校的教、职员就占了三员中的两员。但也有一些人发了战争财,在我的住处附近,云南省财政厅的一位科长竟盖了一幢异常漂亮的别墅,足见当时官员之腐败。

联大的图书也奇缺。三校南迁时,南开被炸,图书荡然无存;



北大在被日军占领以后,所藏图书几乎全部落入敌手;只有清华抢运出一批图书。到长沙临时组建,学校仅有中外文图书6千多册,远不及现在一所像样的中学拥有的图书量。到昆明以后,联大虽然设法搜购图书,但由于正处战争期间,且经费困难,也添置不了多少。联大八年累计不过有中外文图书四万八千册,远不敷学校师生使用。教学设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当时不仅条件差,环境也相当恶劣。1939年,日军占领越南以后,常派飞机空袭昆明。有时正上课,警报就响起来,师生迅速疏散到防空掩体里,待敌机飞走以后再继续上课。有一次,华罗庚教授在日机空袭时躲避不及,竟被炸弹炸后掀起的土浪淹没了。后来美国人陈纳德组织了一支“飞虎队”,进行空中作战,情况才渐渐好起来。

尽管当时联大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师生坚信抗战必胜,终有一日将“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所以大家情绪很高。正是在当时处于战争的恶劣环境中,我开始从事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成就。

308

我长期想以科学救国。“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一直想如何利用科学技术为抗日战争服务。在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府把许多科学家组织起来,加强战时国防科学研究,这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中国政府也将会这样做,于是自学了弹道学、空气动力学等,待机报效祖国。但蒋介石政府在战争期间一直没有着力组织科学家开发军工,我的希望也未能如愿。到西南联大以后,我便开始对应用价值较大的湍流理论进行研究。

湍流运动是一复杂的流体运动。湍流理论是流体力学中的一个难题。19世纪中叶,法国的一位工程师在修建巴黎的水利工程时发现了湍流运动形式。后来法国人纳维(Navier)和英国人斯托克斯(Stokes)提出了流体运动的基本方程,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1895年,英国力学家雷诺发现充分发展了的湍流可分为平均运动和脉动两部分,并从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推导出湍



流的平均运动方程。此后国际上的流体力学家都把湍流研究的目光集中在湍流的平均运动及其方程上。从1938年到1940年,我对湍流理论进行了两年的研究后,撰写了《关于 Reynolds 求似应力方法的推广和湍流的性质》一文,发表于中国《物理学报》1940年第四卷第一期。该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需要研究湍流的脉动方程,并用求剪应力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动力学方程的方法建立起普通湍流理论。我用我的这一理论对一些流动问题做了具体计算,结果较符合当时的实验。我的这一研究成果,为以后湍流研究开辟了一崭新的方向。遗憾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外情报交流困难,这一重大成果,国外人知道的不多。

由于我在湍流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少青年人都在我指导下做学术研究工作,像林家翘、胡宁、郭永怀等;联大物理系的不少学生也都转而学习流体力学。

同期,我对广义相对论宇宙论的研究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1939年我在中国《物理学报》第三卷同时发表《论弗里德曼宇宙的理论基础》和《论宇宙空间的球对称性和弗里德曼宇宙的理论基础的解释》两篇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弗里德曼宇宙”,使弗里德曼宇宙的度规表达式的求解大大简化。

1943年,我按规定可享受第二次休假去美国。国民党政府通知,到国外休假教授,可以持官员护照,享受官员出国待遇。在领取官员护照前,休假的教授须先去重庆接受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政治训练。显然这是国民党政府拉拢教授的一种手段。我断然拒绝,并表示:“我出国做百姓,无需持官员护照,也不去重庆接受训练。”最后我领取了美方签发的普通护照的签证。

9月,我同王蒂澈及三个女儿启程。这次去美国的旅程较有波折。1943年正是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日本除占领中国大陆东部以外,在东南亚,它已占领了香港、老挝和缅甸等地,只有印度尚控制在盟国手中。我们先从昆明乘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转火车去孟买,在孟买我们登美国的 Maraposa 号客



轮。由于孟买附近海域常有日军舰只游弋,我们登上船三天以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关闭所有的船灯,Maraposa号才缓缓驶出孟买港。由于担心遭遇日军舰只,我们乘坐的船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经一个多月的航行,才到达美国的旧金山。很幸运,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抵美后,我去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登记做访问教授。当我安排家眷住下以后没过几天,美国移民局通知我可以加入美国籍。我心里纳闷,不知何故。后来才知道,二次大战期间,三种进入美国境内的外国公民,美国移民局给予现在称之为绿卡的签证。这三种人是教师、牧师和商人。我是以教授身份去美国的,所以美方给我在美的永久居住权。但加入美国籍,做美国公民,我从未想过,尤其在祖国危难沉重的时刻,我殷殷在怀的更是与祖国同难共命、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入籍美国。

在加州理工学院,我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深入研究湍流理论。1945年我在美国《应用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湍流运动的两种解,是我1940年所提出的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十年以后,我所提出的湍流的解在国际上发展为湍流的模式理论。1945年,这一文章被国际科学界视为经典。该文至今仍为人们引用,我也被公推为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

1945年,我受邀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的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加强国防研究,组织利用全国各地的科学家,成立了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该局属民间组织,它的研究项目一般都散在各大学里,充分利用高校的人才和设备进行研究。我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承担了鱼雷空投入水的科研项目。

关于鱼雷空投入水的研究,日本在1929年就开始了。美国提出这一研究课题则是在二次大战期间。1942年,日军进攻新加坡。新加坡当时是英国的属地,英国当局仅派“威尔斯亲王号”



和“抗拒号”两艘战舰去守护新加坡。丘吉尔声称：“威尔斯亲王号”战舰坚不可摧，炸弹投在它的甲板上就如同花生米散落在地上一样。但这艘被英国首相给预测如此高的赞誉的战舰，到新加坡不久就被日军用空投鱼雷击沉了。这使美英政府大为震惊，便召集科学家进行研究。我以研究湍流理论闻名于世，所以被美方邀请参加。而像我这样热爱祖国的科学家，却只能在美国参加服务于反法西斯的军事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一种讽刺。

鱼雷空投入水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计算空投鱼雷入水时所产生的冲击力，它决定着空投鱼雷的设计。我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提出了计算空投鱼雷入水时所产生的冲击力的方程，经试验证实完全正确。但当我在研究取得成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我的研究成果未能运用于反法西斯战争。后来美国人借助我的理论设计出了水上飞机降落到水面上所受到的冲击力。

伴随二次大战的结束，服务于战争的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终告解散。参加该局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大都离去，只有一小部分人留下来做收尾工作。关于鱼雷空投入水项目这一小组的研究工作，由我留下来负责写总结报告。报告成文以后，我提交给美方二份，自己也留了一份。美国海军部立即将此件划为保密文件，直到1957年才解密。我国海军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向我了解我的战时研究工作时，我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他们。

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解散以后，美国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试验站，并希望我能参加。去该站做研究工作的人，待遇甚优，每年可收入六千多美元，实值合现在六万多美元不止，是当时美国高薪教授的水平。但海军部是美国的政府部门，在海军部所属单位任职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公务员，外籍人员须加入美国籍才能参加。我当即向美方提出参加海军军工试验站的三个条件：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能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我可以随时离去。这样，我又一次拒绝了加入美国籍。



在我第二次休假去加州理工学院这几年,正是我国最重要的历史时期。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神州大地,华夏子孙,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但是,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八年战争以后,一场由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的内战又将落到人民大众头上,中国正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

加州理工学院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像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钱伟长等,他们常到我家来。林家翘、郭永怀、钱伟长都曾跟我学习过,与我很熟悉。他们每次相聚总有一场关于中国未来的争论,主角是钱伟长和郭永怀。钱伟长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郭永怀则认为美国社会有竞争,而前苏联没有,竞争有利于社会发展。两人各执一端,有时在吃饭桌上就争吵起来。我虽然对前苏联社会不了解,但在美国,看到大垄断公司很多,普通百姓与大公司打交道总吃亏,这种感受我经历过,加上我对国民党政府一直没有好感,因此在思想感情上我倾向共产党。

在海军军工试验站工作了半年多,至1946年6月,我只身从美国赴欧洲。首先我代表那时国内的中央研究院出席了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大会(牛顿诞辰300周年应在1942年,因为战争,纪念会延至1946年举行)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9月又去法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并被大会选为理事。1946年年底返回美国,准备从那里回国。当时国内内战已爆发,祖国前途未卜。我在美国的一些朋友都劝我不要回国。国内的一些亲朋好友也不远万里致函进言,劝我与妻子和孩子留在美国。我又处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一面是学术研究条件好、生活又优裕的美国,一面是养育了我却处于战争中的祖国。我想,我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但我是中国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共产党人和我都是祖国的儿女。“桔生南国,受命不迁”,我不能把自己的生命之树移植在异国他乡,应该回到祖国,回到清华。1947年2月,我毅然同妻子和孩子一起离开美国回到了常在念



中的清华园。

回国一年以后,我应邀再次赴英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这一次与会,我的处境很窘迫。1946年我与会时,正值二次大战结束,苏美中英是世界四大国。中国科学家在会上受到应有的尊重。在会议闭幕式上我作为中国代表发言,听众通过热烈的掌声向我表达了友好的情意。到1948年与会时,形势完全不同了。在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中,其军队一败涂地,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种变化在国际科学交流活动中明显反映出来。我是应用力学大会的理事,有一次开理事会,我提前几分钟到场,看到会议主席(一个英国人)把我的位子放在最后。会议结束时有一次宴会,由于开理事会时受到冷落,我心中不悦,就说:“今天我是敬陪末座。”果然,宴会主持人将我的位子摆在倒数第二位。参加这次大会使我深深感到,即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我从事国际科学交流活动的背后,也必须有一强大的祖国,我才能站起来!

1948年11月7日,我从欧洲返回北平。这时,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已成定局,北平处于解放的前夜。12月12日,解放军已达海淀。这一天,梅贻琦从市里来到清华,主持最后一次校务会议。会后我把他请到梅家对面的住宅里,劝他不要走。两天以后,解放军到达清华园,人民军队严明的纪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我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



人生的道路怎样走(节录)

苏步青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根本看法,包括人为什么要活着,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等等。我的人生观是经历了三个朝代而最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形成的。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活着就是要为人类做出贡献。

有的同学问:“您究竟为了什么要成名?”我首先要指出,一个人并不是自己想成名就能成名,而是长期间经过脑力劳动,艰苦奋斗,做出贡献之后才取得的。我小时候,抱着为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发奋读书,每次考试都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在留学日本期间,添上为祖国争光这一动力,开始在学业上有了较大的进步,并取得了理学博士学位。现在回想起来,真正做出一些成绩,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从50年代起,在共产党教育下逐步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决心尽自己所能,把为祖国出好数学人才看作自己应尽的责任,提出一代超过一代,而首先学生超过我自己。在这思想指导下,培养了大批人才。有人说,“名师出高徒”,但是我则认为由于有了高徒,我才被封为名师。可见,能够成名并非坏事,关键在于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千万不要有了名气,就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甚至堕落到反党、反人民而成为知识分子的败类。

有的同学问:“名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名誉是党和人民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名誉只能代表过去。我现在虽然担任



全国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名誉校长等职务,但我不愿意在家里享清福,不做点工作心里就感到不安。今年八十七岁了,年纪不算小,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学校办公室,在那里不是阅读文件,就是撰写数学著作。近十年来积少成多,出版了八本专著,共一百多万字,其中有四本是在外国出版的。退居二线之后自己觉得还有点精力,为中学教师举办三次(一年一次)培训班,让教师多掌握一些数学知识,以利于提高中学数学教学质量。一个人活着,就要全力以赴地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决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

有的同学说:“现在读书太辛苦,不如个体户赚大钱。”毫无疑问,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是很艰苦的。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如果把一生的希望寄托于“机遇”,则将一事无成。这里要树立正确的理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仅仅为个人今后能过美好舒适的生活而学习,那未免太渺小了。青年同学要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眼睛只盯着个体户赚大钱上,就会贪图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理想,逐步走上堕落的道路,那是十分危险的。利令智昏,古来就是如此。国家的四化建设需要千百万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国家不强盛,人民就要受欺侮,历史的教训切勿忘记。我之所以有今天,可以说是在一辈子艰苦奋斗中得来的。不付出血汗,希冀成绩会从天而降,那是幻想。

1989年10月16日



人生感悟(三则)

钱歌川

祸从口出

傅玄说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两千年来仿佛成了至理名言，无可否认似的，其实这不是绝对的真理，从口中吃进去的病痛，只有肠胃病之类，仅占疾病中极小的一部分，疟疾就是蚊子传的，狂犬病就是疯狗咬的，伤风感冒，乃至什么癌症，都不是从口里吃进去的。

而“祸从口出”这句话，更宜附相当的条件，尤其不应出自谏官傅玄之口，他专门用言语指摘别人，使当时的奸佞慑伏，也并没有因此得祸。他只是为着要写一篇谈口的文章，所以才把与口有关的各种可能性凑合在一起，为行文的方便而这样说，并不一定是由于发现了什么真理才下笔的。

不过在某些情况之下，说话不谨慎，当然是可以惹祸上身的。有些暴君做了坏事，却希望他的臣民恭维他做得好，如果有耿直之士去加以非议，就常要遭杀身之祸。我记得在军阀时代，有一位爱国志士遭当局暗杀，在举行盛大的追悼会上，友人舒之鉴主张要缉凶，结果凶手未缉，而他也跟着被刺死了。

在真正的民主到来以前，是不会有言论自由的。言论既不能有自由，心直口快的人，说话就不免要惹祸上身了。所以明哲如孔子、耶稣等古圣贤，就劝人隐恶扬善，即是别人做了好事，你不妨多多地去为他宣扬，他听了自然高兴，一定对你怀抱好感。



至于看见别人做了坏事,你就要装做没有看见似的,多多的包涵,绝口不说出一个字来。这正所谓明哲保身的态度,个人主义发展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了。但积极的社会改革家是决不赞成的,有正义感的人,也忍受不了。正同古代那些忠谏的名臣,他看不惯邪恶,便要冒死说出以求改善。

崔涂诗云:“致君期折槛,举职在埋轮。”上句说的是汉朝有位槐里令朱云,奏请成帝斩除安昌侯张禹,帝不听反而要杀他,他的目的只在除去奸佞之徒、致君于尧舜,自身之死不足惜,但死前希望皇帝答应他除奸,所以攀住殿槛不放,卫兵拖着他走,以致把殿槛都折断了。他当初何尝不晓得直言说出,是要触怒皇上,而惹祸上身的呢?不过他宁死不愿与那坏人两立,看不惯那些坏事,所以说,说出来了,心才得安。

下句却正是上述的明哲保身的一个很好的例证。那是和冒死忠谏的情形,恰恰相反的。据后汉书张纲传所载:在东汉顺帝的时候,梁冀掌握政权,非常跋扈,无所不为,皇上派遣八个督察专员去巡行各地,看那些小官有无贪赃枉法情事,用现代时髦话说,即是不打老虎而打苍蝇。张纲虽是八个当中的一个,但他却说:“豺狼当路,安问狐狸?”所以把他的车轮埋在地下,无车自然不能出门去视察了。眼不见为净,看了不能不说,还是不看的好,尤其是浊水横流,没有好的事情可说,索性学金人三缄其口,不说为是,以免祸从口出。

但是世界上自从发现了那珍奇的宝物——言论自由的时候,整个的情形就完全改变了。记得罗斯福总统曾说过,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呢?他说得对,我们自然应该接受;他说得不对,徒然暴露出他自己的弱点。“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贤明的人是决不会乱说话的,说出来的话,一定有相当的分量。民主政治的方式,就是要大家来说话。议院是大家来议论的地方,怕的是大家不说话,那就失去民主政治的意义了。

说直话早已不应该再惹祸了。除非你是故意中伤,捏造一些事实去诽谤人家,那就自当别论。所谓言论自由,并不包含恭维



的话在内,因为这种自由是新发现的一种元素,而所谓扬善式的专说别人的好话,那是陈腐到几千年的旧货呢。

现在的言论自由,主要是指摘社会上的坏事,或非难当前的秕政,其用心无非是想求改善,使民族国家进于完美康乐的境界。如果政治清明,社会安定,风俗醇朴,人心端正,那末,言论自由早无用武之地,虽有存在而无作用。因为它没有可指摘的对象,更失去可促进的目标了。

许多不民主的政府,都要钳制言论,不许人民有言论自由,实足以证明言论自由与那些政府是势不两立,互不相容的。如果言论自由不是责难而是恭维的话,他们一定欢迎之不暇,而决不会加以钳制的。可见言论自由,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原不包括恭维在内,这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议会中有的激烈的质询指摘,报纸上时见精辟透澈的文章,舌锋所指,毫不容情,不畏权势,也不怕犯众怒,看不顺眼的事就说出来,从不会发生因言论的指摘而招致灾祸之事。

英国人在海德公园中热烈地攻击当局,批评现政,警察站在旁边静听,只要他不动手,不造成刑事,单凭口说,是谁也不能干涉他的。在赋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民,祸只能从手出,而不能从口出,无论说什么责难人家的话,也不会因而惹起祸患的。

谈兴趣

晋书王徽之传上,载有他这样一回事:“尝居山阴,夜云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逵,时在剡,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来,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

由王徽之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兴”之一事,对人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能乘兴去做什么,一定可以克服种种困难,把事情做得很好。正如曹植写给丁敬礼的信上说的,“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证明乘兴就能含欣,做起那事来,便感到快乐了。

所谓兴就是兴会,也就是情兴所会,说得更通俗些,便是兴味



集中的所在。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兴趣,即是说“意之所趋而有愉快之感者”。王勃在滕王阁序上说,“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更显明地拿兴与悲对称,而用作欢的代用语了。

世说新语赏誉篇中说:“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闲,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可见朋友虽闹翻了,到了兴会来时,还是免不了要旧情复炽,而为之相思不置。一颜氏家训中说的:“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以及沈约说的:“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规前秀,垂范后昆。”就都是说做文章时,也非有兴致不可。沧浪诗话中批评:“近代诸公,其作务多使事,不问兴致”,所以也做不出好诗来。

我现在想要说的,当然不限于指作诗、写文章这一方面才需要这种兴会或是兴致,小而至于访问一个朋友,大以至于成就一种事业,都莫不需要兴会来做它的原动力(上面说的兴会或是兴致,都是比较古老一点的说法,我们现在还是用兴趣一辞吧。)。从前有位美国朋友,想请我去为他们编一个刊物,一切条件都讲好了,最后他还再三地问我:“你对于这工作真的感着兴趣吗?”他很懂得什么是对工作最重要的事,所以他不论我对待遇满意与否,而只问兴趣如何。有些铜臭很重的人,迷信金钱万能,以为只要能出高价,便可买到别人的劳力,不问那工作对别人有无兴趣。体力劳动者他或许可以如愿以偿,对于一些劳心用脑的人,就非有兴趣是不能使他们支持长久的。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就是说,知道为学重要的人,不如喜爱为学的人之能孜孜力学,喜爱为学的人,又不如对为学感有乐趣的人之能专心致志,学而不倦。对为学感到乐趣,在孔子看来,认为是最理想的学习条件,这位圣人真不愧为万世师表,什么教育原理,都尽在他这一句话中了。我们教书的人,教得好不好,就看我们能不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对你教的这一科目发生了兴趣,便什么都好办了。他们必然的非有进步不可,因为兴趣使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兴趣使他们努力向上,废寝忘餐地去贪读研求,这样一来自然就容易学